

#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sup>x</sup>

陶飞亚

---

**内容提要** 爆发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关键词** 共产国际代表 中国共产党 非基督教运动

---

1922 年初春,波及全国许多城市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政治、基督教会、特别是此后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场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五四以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作为一次集体行动,在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要探究这场运动的起源,如这些学生究竟是如何起来或者由谁动员起来进

---

x 本文曾提交/东亚基督教再诠释0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2002 年 10 月)。

行这场斗争的？它究竟是一场随机触发的学生骚动，还是出于某种政治行动的计划？

当时西方在华报纸及基督教教会方面把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归因于共产党。但这种说法一则受制于言者自身的立场，二则也拿不出实在的证据，所以多少只能算是一种猜测。迄今的研究成果对此也说法不一。美国资深学者鲁珍（Jessie G. Lutz）1988年在《中国政治与基督教差会》（1920-1928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一书中断定：“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仍然是小团体和精英的活动，无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尚未准备提供指导和组织。”<sup>1</sup> 1994年杨天宏在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中对运动与政党的关系多了一些分析，他指出虽然“不应当无视政党参与对于运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难以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杨注意到一些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等在运动中引人注目的作用，但他对此解释说，“党员个人的参与并不能代表整个政党，如果一个政党的思想政治纲领没有对这场运动产生直接作用，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政党参与了运动”；他认为共产党刚建立尚无能力进行这样的斗争。<sup>2</sup> 但与上述说法不同的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党史著作则说明是中共发动了非基运动。<sup>3</sup> 然而，这究竟是地方党组织的行动还是中央的行动，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迄今出版的全国性党史著作几乎未涉及党与

<sup>1</sup> Jessie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 (Notre Dame, IN: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INC., 1988), p. 67.

<sup>2</sup>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sup>3</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非基运动的关系。

但是,即便肯定地方性的党史著作言之有据,我们也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尤其是后来积极参与非基运动的人中有一些曾经对基督教有过比较正面的评价。如陈独秀在 1921 年 1 月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sup>6</sup>,对耶稣的精神极为推崇。胡适甚至说过“这时期的陈独秀差不多成了一个耶稣的信徒了”<sup>1</sup>。李大钊曾专文介绍过美国的宗教新村实际也就是基督教乌托邦运动。<sup>2</sup>瞿秋白在五四之后曾接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创办《新社会》杂志,在俄国观察五一节和复活节时,对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有“奇异的感想”<sup>3</sup>。而在非基运动中激烈反对基督教的恽代英则参加过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在他的日记中对基督教会包括青年会也有不少正面的看法。<sup>4</sup>总起来说,从他们当时的文章中,并没有对基督教有十分强烈的反感。倒是少年中国学会中另一些人及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最早掀起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但在随后的非基运动中,陈独秀、恽代英等对基督教会批评最为深刻和激烈。历史学者往往根据他们在党成立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思想变化来解释他们对基督教看法的转变,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某一方面的思想转变不一定必然导致某一种统一的政治行动。所以问题还是回到了他们在同一时期猛批基督教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共两党及其一些政治派别的成员

<sup>1</sup> 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19 页。

<sup>2</sup> 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星期评论》第 31 号,1920 年 1 月,见《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5、198 页。

<sup>3</sup>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60 页。

<sup>4</sup> 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4、136、142、180、366、368、369、403、433 页。

涉身其中,我们在探讨这一运动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集中在国共两党及几个政治派别身上,而忽略了观照国际政治格局考察当时中国政局的真实态势:中共刚刚成立,国民党组织涣散,而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代表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忽略这一时期俄共代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作用,孤立地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非基运动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些问题可能是难以说清楚的。事实上,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查抄苏联驻华大使馆时就发现了俄方文件中提到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领导的<sup>1</sup>。这至少表明了俄共可能与此次运动有点关系。不过,倘若没有新材料的披露,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会受到同样的限制。但1993年以来俄联邦开放的关于联共(布)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的有关档案,逐渐被译介到中国,终于为这一探讨提供了新的条件,使本文得以从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档案文献及有关资料入手,考察他们与非基运动的关系,尝试对非基运动的起源做出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 一、共产国际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发起

在可以见到的中共党史资料中,有关党与非基运动关系的文献比较少见,但早期中共党员邵力子在回忆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时,说/那时党组织给我的任务都做了,主要是反帝,反宗教<sup>2</sup>。

---

<sup>1</sup> 原文经英译载1928年1月28日的China Illustrated Review,转自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第123页。

<sup>2</sup> 邵当时在上海主编《民国日报》,该报是非基运动的重要喉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但邵的说法过于简单。可能由于参与非基运动或者知情的如陈独秀、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等都早就去世或牺牲,类似的记录保留下来的较少。因此,对于中共成立之初为什么及如何发动这场斗争我们仍不很清楚。俄联邦的开放档案记载的比较详细。

第一则材料是 1922 年 4 月 6 日,时任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北京给俄共(布)中央委员拉狄克的信中说:“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它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是一种抗议行动,尔后变成了广泛的运动,现在在号召为国家的统一而联合起来,已在更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目前要把这场运动纳入政治运动轨道,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伪装的合法组织。”<sup>1</sup>

这里的“我们”究竟指谁还说不明确。第二则材料即于其后不久的 1922 年 5 月 20 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就在中国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长篇报告中说:“共产主义小组搞一些宣传运动,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反基督教运动”。他明确指出,英国人的报纸断定“整个非基督教运动只不过是一个隐蔽布尔什维克的屏幕,它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利金还说明“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 7 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这些计划包括 5 点内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派我们的同志以代表身份参加基督教代表大会,从内部破坏这次大会;(5)派我

<sup>1</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0-81 页。

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同盟。<sup>1</sup> 利金在这份文件中强调了/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sup>0</sup>。显然,这份文件充分表明非基运动并非只是/学生团体<sup>0</sup>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宗教的批判”,而是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文件所提供的斗争策略,例如组建/同盟<sup>0</sup>、制定章程,都反映出运动高度的组织化,标志着中国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上面说到的/我们<sup>0</sup>中,究竟是俄共代表还是早期中共领导首创发起非基运动的呢?利金的报告说:/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和广州存在着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的小组。这些地方有青年团。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陈独秀同志参加。青年团根据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做工作,而所有的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sup>0</sup><sup>4</sup> 确实,从中共建党到发动非基运动不过半年左右,从1921年12月到1922年4月,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开展了四项运动,其中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周年纪念这样的活动,这确实有受俄国革命影响的特点。李维汉在回忆与国际代表的交往时曾说过:/那个时期中国的党还属幼年,还需要国际代表帮助,但据

<sup>1</sup>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88、92页。赫尔扎诺夫斯基#利金是1921\$1922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的代表,1923年从事外交工作。

<sup>0</sup> 有兴趣的读者对照利金的报告与杨著或鲁珍 著作中关于非基运动早期的事件,可以发现除了个别事实外,利金对运动的了解极为详尽。

» 持这一看法的不仅有鲁珍 和杨天宏,美国杨伯翰大学米切尔#莫道克(Michael Murdock)在近年关于非基运动论文中仍这样认为。见 Michael Murdock, / Poor2 man s Ant2imperialism? The Ant2Christian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Value of Cul2tural Targets for Revolutionary Activity, August 1924\$ June 19250, (香港)5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6第3期,2000年,第63页。

<sup>4</sup>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92页。

我所知道和听说的, 国际代表们的方法不大好, 不是告诉小孩子如何吃饭而是代替小孩子吃饭, 代替小孩子走路, 有好多文件都是他们代替起草。<sup>01</sup> 因此, 大概可以肯定, 中共创建之初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 俄共代表的意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在非基运动前后来过中国的俄共代表中, 领导和参与非基运动的还不止利金一人。在 1920 至 1921 年曾经在中国帮助建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对莫斯科的中国政策有重要影响的俄共代表维经斯基, 确实对西方在华基督教特别关注, 曾在 5 向导 6 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sup>02</sup> 可以推测, 维经斯基自 1920 年 4 月至 1921 年 8 月在中国各地推动建党, 与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触, 从而对他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非基运动发生时, 维经斯基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因此, 利金所述的远东局书记处指示, 也很可能出自维经斯基之手。

还有一位对非基运动非常了解的是 C.A. 达林。达林 1921 年起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之一, 后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工作, 1921 至 1927 年间, 达林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和远东青年代表大会。曾于 1922、1924、1926 年三次来中国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说到他 1922 年春到上海, 见到陈独秀与瞿秋白。在与中共中央局的成员开会时讨论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将在北京开会的情况。达林在回忆录中记载: / 在后来几次会见时, 有一次谈到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组织 1922 年 4 月将在北京召

<sup>1</sup> 5 李维汉同志 1979 年 11 月的一次谈话<sup>6</sup>,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 5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sup>6</sup>,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428 页。

<sup>02</sup> 魏琴: 5 帝国主义与反基督教运动<sup>6</sup>, 5 向导周报 6 第 2 集, 1926 年 9 月, 第 818 页。

开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朝鲜革命组织有时以基督教青年会做掩护,而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亲美派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力求揭露基督教青年会的亲帝国主义实质。<sup>0</sup>达林本来是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因反基督教青年会运动而使会议的筹备工作推迟。<sup>1</sup>

另外,早在非基运动发动前,俞秀松、张太雷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9)23日)。大会在题为5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6第13条就指出,/(殖民地)大部分青年处于基督教青年会及各种美国民主组织的影响之下,,0°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5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6第23条中指出:/革命青年组织应当进行反对青年反动政治组织和一般反动政治组织的斗争,应当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团体和政党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通过向广大群众揭露此类组织的实质,我们就能使青年群众从这些组织的影响中解脱出来。譬如,对基督教青年会和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就必须这样做。0”可见,这两次大会都非常强调反对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性,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5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6等文件中。这些文件的译文刊载在5先驱6等刊物上在国内流传。<sup>¼</sup>达林在上海和陈独秀、瞿秋白等见面时,认为陈独秀等已经掌握了莫

<sup>1</sup> C.A.达林著、侯均初等译:5中国回忆录:1921\$1927年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页。

<sup>0</sup>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5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 5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6,第77页。

<sup>¼</sup> 5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6,第81、85\$86页,原载5先驱6第11号,1922年9月3日;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



斯科远东革命组织和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sup>1</sup> 因此, 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各种文件, 我们现在大致可以认为 1922 年在全国迅速引起巨大反响的非基运动, 不是一次自发的运动, 而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 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 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 同时, 正是由于政党有组织的发动, 才能形成在全国许多城市一呼百应的声势。

1922 年以后, 非基运动时断时续, 反对基督教的学潮乃至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直到大革命失败才告一段落。1924 年以后, 中共成员在上海等地继续非基运动的斗争。国民党成员积极参与了在广东地区的非基运动, 以致美国学者认为国民党中的/ 革命者 0 利用非基运动提供的一个文化/ 取向度 0 来巩固在广东的政治基础。<sup>2</sup> 不过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非基运动的关系, 事实上, 国际代表除了最初直接策划了非基运动外, 在以后错综复杂的革命局势中, 仍一再表现出对非基运动的关注。1925 年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要求/ 注意采用基督教青年会的种种好的宣传经验, 并想出各种好的方法去引诱青年工农 0”。到 1926 年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中国青年团的材料, 国际中央委员会回信中指出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中央注意几个问题, / 这信里没有提到- 反基. 运动, 但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有许多要说, 而且看到你们的错误, 我们立刻

<sup>1</sup> 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 1921-1927 年》, 第 59 页。

<sup>2</sup> Michael Murdock, / Poo2man's Ant2imperialism? The Ant2Christian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Value of Cultural Targets for Revolutionary Activity, August 1924) June 19250, (香港)《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 3 期, 2000 年, 第 77-78 页。

<sup>3</sup> 5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1925 年 4 月前), 《5 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第 153 页。

就会写信给你们<sup>1</sup>。从这些文件中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青年共产国际比中共和青年团更关注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显然这种一再强调并非偶然,而是与他们对基督教与革命运动关系的认识有关。

## 二、发动非基督教运动的政治动机

既然非基运动是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的中共与青年团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场运动?

直到发动非基运动之前,刚刚诞生的中共被共产国际的代表视为/ 组成部分是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通常都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而且/ 积极活动能力较差。但共产国际代表也看到/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青年学生中间却有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大规模的运动。<sup>2</sup>年幼的中共对工人运动比较陌生,但对学生运动则有五四的经验可以借鉴。不过,要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必然会遭遇到西方在华基督教会,特别是当时极为活跃的基督教青年会。

很多学者都指出,义和团运动之后的 20 世纪最初 20 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 黄金时期。”无论信徒规模、高等教育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均是如此。基督教以改造社会相号召,积极在青年中开展活动。尤其是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对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影响日益扩大。从恽代英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参加过基督教青

<sup>1</sup> 5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中央书 6(1926 年 10 月 18 日),5 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6,第 197 页。

<sup>2</sup> 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6(1),第 86-87 页。

» 参见杨天宏 5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6 第二章第四节。

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听艾迪讲中国人如何/爱国<sup>0</sup>的演说而深受感动。远在美国的胡适也曾经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所吸引,差点成了基督教徒。当时基督教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在城市生活的人都能感觉到基督教的活动。连在华天主教会都感觉到基督教/炫耀大笔财富,大举制造声势<sup>0</sup><sup>1</sup>。值得强调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新教越来越美国化。韩国学者白永瑞认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与传教士的教育事业无疑是一条向中国青年学生传授美国的价值观的通道,作为新教国家的美国传教士对于近代教育机构的设立、经营方面,与英国或法国传教士相比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sup>0</sup>。因此,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就是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早期中共活动分子中留美归国者凤毛麟角可能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青年学生倾心美国文化,想走美国人的路,这无疑对中国/走俄国人的路<sup>0</sup>是一种巨大的阻碍,因而,基督教也就成为中共在青年学生活动中的对手。

俄共最早派到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看到了这一点。1913 年,他移居美国,1915 年在美国参加社会党,涉足政治活动,1918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俄国参加革命斗争。他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对美国文化有直接的了解,对西方教会在中国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中知识界的亲美气氛,有更敏锐和深切的感觉。早在 1920 年 8 月 18 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

**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始后,我们通过**

<sup>1</sup> 5 论非教运动 6, 5 北京天主教通讯 6 第 105 号, 1922 年 5 月, 第 83 § 84 页。5 中国与日本传教会 6 第五年度, 1923 年, 第 575 页。转自巴斯蒂 5 中国天主教会与新文化运动 6, 见郝斌、欧阳哲生编 5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6 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47 页。

<sup>0</sup> 白永瑞: 5 自大与自弃的双重变奏: 五四时期青年的文化认同危机 6, 见 5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6 下, 第 1356 页。

我们的革命局(其成员在上海、天津和北京对学生有影响)指出,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是依靠民主美国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

我们还指出,一部分民主派学生的观点有空想性质,这部分学生认为,可以通过利用外国非侵略性资本(美国资本)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方式来拯救国家,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应该是国家生产力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中国的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学生的观点)。<sup>1</sup>

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就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

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来抵制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与这种依靠美国的方针相对立,我们提出了面向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与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即所谓的中国学生联合会)作思想斗争,因为这个学生团体认为,可以利用美国非侵略性资本的垄断来拯救国家,似乎美国非侵略性资本主义应当也能够保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并改善群众的经济状况。<sup>2</sup>

继维经斯基之后到中国的达林,在专门写给中国社会主义青

<sup>1</sup> 5 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6(1),第34页。

<sup>2</sup> 5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6(1),第53)54页。

年团的文件中对基督教青年会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竞争关系说得更明确具体。达林声称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在中国 30 个城市和 174 个专门的学生组织中拥有 712 万名会员,这些组织的 400 个领导人中有 80 个美国人,仅在 1920 年一年,美国花在中国青年会的经费就有 15 万美元。<sup>1</sup> 他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是我们很有力量的一个仇敌,也是我们要尽力去反对的一个仇敌<sup>0</sup>。/帝国主义所以能在中国横冲直撞,无忌惮地实行其侵略政策,正是这班东西在其中作怪!<sup>0</sup>达林不仅强调反基督教青年会,还主张为了反对青年会, /我们很要学一学基督教青年会的方法, ,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很有与中国青年群众接近的经验,他怎样能使青年群众相信他,笼罩在他势力范围之内,这是很值得我们考察的一件事。基督教青年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文化运动,而中国的文化程度很落后,一般青年对于提高文化程度的运动也很渴望,于是什么地方有这种运动,他们便到什么地方去参加,并恭受那种奴隶文化的影响,因此,一般青年不期然而然地便堕入那青年会势力范围之中了。<sup>0</sup>

实际上,直到 1924 年俄共代表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并已打开局面之时,鲍罗廷仍然认为:

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学校里学习,与中国学校相比,这些学校也只能引起这些人的羡慕。在每年派往国外,主要是派往美国的几千名中国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回来时成了美国等地的出色的宣传员。”

<sup>1</sup> C.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 1927 年》,第 61 页。

<sup>0</sup> 5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意见))) 草拟扩大执行委员会青年工人与农民议决案的说明书(1924 年 3 月),5 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 132\$ 133 页。

» 5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422\$ 423 页。

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也感受到了美国影响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的妨碍。1923年7月,毛泽东对美国在湖南的势力做了如下概括,他指出,外商在湖南的势力以英商营业较大,日商次之,美国又次之。三国在长沙均设有领事。而在文化方面,美国的势力特别大。/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事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美国留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股浓厚的亲美空气。<sup>0<sup>1</sup></sup> 蔡和森认为:/最近几十年以来,英法日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势力,美国几乎插足不进,于是美国政府唯一的政策便是到中国来传教、办学堂、做慈善事业,以收买中国人的欢心。这种政策果然渐渐成功,中国人怨日英法日甚,而对美发生莫名其妙的亲善、好感。<sup>0<sup>2</sup></sup> 1923年12月8日,恽代英发表《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sup>6</sup>,文中认为:/基督教实在只是外国人软化中国人的工具。<sup>0<sup>3</sup></sup> 1924年6月恽代英在给友人的公开信中指出:/基督教所以在中国还能像今天这样盛行,完全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我们要尽力社会活动,没有可以依赖基督教的道理。我们只须看教会做事的人与教会学生永不敢反对牧师、神父们的祖国,便可知教会是如何一个可怕的东西了。<sup>0<sup>4</sup></sup> 可见,这些共产党人对基督教会给革命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正如鲁珍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革命时代的中国/不仅提供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而且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传教士是一种导致思想混

<sup>1</sup> 毛泽东:《省宪之下的湖南》,《前鋒》第1卷第1期,1923年7月1日,转自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sup>2</sup> 《近代的基督教》,《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0页。

<sup>3</sup> 《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

<sup>4</sup> 《基督教与社会服务》)) 答南京民作君,《恽代英文集》上,第558页。

乱的力量<sup>1</sup>。

同时,来自俄国的革命者除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影响极为警觉之外,他们对基督教也有特别的认识和实际的斗争经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对站在对立面的东正教会进行了坚决的打击。1918 年 1 月 23 日,列宁发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的命令。在发布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同时,政府对宗教界进行“清洗”,1922 年彼得格勒的都主教维列明(Veniamin)受到公开审判,很多教士从社会上销声匿迹。<sup>2</sup> 赫克(J. F. Hecker)在《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一书中,描写了俄国教会与革命的对抗以及俄共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动的一系列反宗教活动,包括宣传鼓动,组织“不信神同盟”,举办展览,建立反宗教博物院等等。”整个 20 年代,是俄国反宗教活动不断强化的时代。对于一心想把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来的俄共代表来说,寻找时机发动一场打击基督教会的运动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在俄共代表看来,非基运动是一石数鸟的机会。利金在报告中认为,非基督教运动表面上看是青年学生反对 1922 年 4 月 4 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基督教同盟代表大会,但实际上,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因素是对外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这个因素把最大量的同情者,即政治上不成熟,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大青年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第二个因素是与我们更加贴近的一种运动,也就是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即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家代理人的抗议,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sup>1</sup> Jessie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 (1928), p. 282.

<sup>2</sup>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2 页。

<sup>3</sup> 赫克著,高骅、杨缤译:《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9-337 页。

和直接附属它的一些团体打出了这些口号。第三,一些无足轻重的阶层,受到对基督教的宗教排斥感情的支配,也可能参加非基督教运动。最后,纯反宗教的知识分子无神论团体也加入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总战线。它们试图在运动进行最激烈的时刻,把它推上科学的反宗教运动轨道。<sup>01</sup> 利金认为当时尽管共产主义小组对工人运动影响甚微,但/所谓非基督教运动则无可争辩地证明,这些小组能够把大批的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吸引到广泛的运动中来<sup>02</sup>。因此,非基运动可以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的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重要的可以在青年学生中扩大党的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达林报告说,在非基督教学生运动期间,社会主义青年团巩固成长。青年团员超过了 3000 人,在 17 个城市中建立了组织。”

还有一点,在中国的反帝斗争中,非基运动是最能取得合法地位的政治运动。一则基督教在中国鸦片战争后就名声不佳,正如柯文(P. A. Cohen)所指出,明清以来中国知识界有反对基督教的传统。而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关于宗教问题的学理辩论,已经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从认识论的角度在科学主义和进化论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sup>1/4</sup> 非基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蓬勃发展,即使是北洋政府和各地军阀,也不能不对公然镇压反基督教的群众运动有所顾忌。二则在俄共代表的计划中,非基运动仅仅是大

<sup>1</sup> 5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6(1922 年 5 月 20 日),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6(1),第 91 页。

<sup>02</sup> 5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6,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6(1),第 90 页。

» C.A. 达林:5 中国回忆录: 1921\$ 1927 年6,第 63 页。

<sup>1/4</sup> 参见柯文5 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6,费正清:5 剑桥晚清中国史6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02\$ 605 页。



规模的宣传运动, 鲁珍<sup>1</sup>说这是一场“纸上的战争”, 采取了最容易扩大影响而不容易招致镇压的斗争方式。<sup>1</sup> 因此, 共产国际代表们对发动这样一场运动都持积极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

### 三、对中国非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共产国际的代表直接参与了非基运动, 他们的思想及对宗教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作为俄国的革命者, 他们对宗教的看法离不开俄国革命的经验, 即离不开俄国反宗教运动的思想 and 实践。十月革命后, 俄国东正教与俄共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俄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打击教会势力, 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反宗教运动做了说明。1919 年 3 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俄共(布)党纲第 13 条指出: / 俄国共产党在宗教问题方面, 不满意于曾经以法令颁布的教会与国家分离, 学校与教会分离的办法, 即不满意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自己纲领中所提出的、但由于资本与宗教宣传的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他们也没有彻底做到那些措施。<sup>2</sup> 党纲进一步指出, / 俄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 才能完全消除宗教的成见。党正尽力打破剥削阶级与宗教宣传组织上的联系, 促使劳动群众从宗教成见中实际解放出来, 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sup>3</sup> 1923 年 4 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出<sup>4</sup> 关于进行反宗教的鼓动和宣传<sup>5</sup> 决议中指出: 尽管一些

<sup>1</sup> Jessie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 (1928), pp. 61, 76.

<sup>2</sup> 5 俄共(布)党纲, 5 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18 页。

教会一方面正在颓败,然而/我们还看见某些教派的显著的发展,这些教派的上层人物与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某些分子在思想上是有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彻底摧毁工人和农民群众中间各种宗教信仰方面的工作,首先必然要具备深刻的有系统的宣传的性质,这种宣传向每个工人和农民明晰地和令人信服地揭穿任何宗教的谎言以及和他们利益的矛盾,暴露各种宗教团体与统治阶级利益的联系,以明确的科学自然观和人类社会观来代替宗教观念的即将消灭的残余。<sup>01</sup> 这些纲领性文件表明,俄共已经把消灭宗教残余提上了革命运动的日程表。

俄共与宗教的斗争和理论是否影响了中国的非基运动,正如中国革命初期受到俄国革命的深刻影响一样,答案是肯定的。在非基运动发起之前,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没有超出科学主义和进化论的范围。1921年3月在法国的李璜曾经在《少年中国》发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一文,提到了资本家信教,因此/平民要反教的想法。李璜的这一认识也来自他对俄国革命后反宗教运动的了解。但在《少年中国》的宗教讨论中,李的观点并未引起广泛的反响。而恽代英在批评田汉(寿昌)《我的宗教观》一文中,仍然是从人的认识和心理的角度来批评宗教。<sup>02</sup> 但是在时隔不久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中体现的反宗教立场则完全不同了,第一,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角度来反对基督教。《宣言》从现代社会分成对立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而现代基督教与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必须反对基督教会。第二,从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基督教。《宣言》

<sup>1</sup> 5 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6,第99页。

<sup>02</sup> 5 恽代英文集6上,第284页。

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为了逃避危机,涌入中国实行经济侵略,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要反对基督教会。<sup>1</sup>人们从5宣言6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当时可能只有国际代表才能对列宁的理论有如此清楚的理解,他们把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批判,引向了阶级斗争和反帝的高度。教会中人士刘廷芳就看出5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6/是像初学布尔什维克的口吻<sup>0</sup>。关注中国非基运动的日本人吉野造作也认为:/若就此次反基督教运动的本体来看,恐怕不外一种翻译的社会主义之主张。<sup>0</sup>”

俄共对非基运动思想的影响,在瞿秋白反基督教运动期间的言论中也有反映。瞿秋白 1920 年底赴俄,1923 年初回北京,在俄国生活了两年,熟悉俄国革命的理论 and 语汇。他于 1923 年 5 月 26 日撰写5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6一文,提出了/文化侵略0这个可以和军事侵略、经济侵略相提并论的新词语。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步骤:一、强辟商场;二、垄断原料;三、移植资本;四、文化侵略。<sup>0</sup><sup>4</sup>从此,反对文化侵略成为反对西方在华基督教及其事业的代名词,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批判武器。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本人也亲自参与了指导反基督教运动的工作,他曾在5向导6发表了5帝国主义与反基督教运动6一文,明确指出,反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所有在教会机关中工作的人员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教会教育机构都是/帝国主

<sup>1</sup> 5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6,5先驱6第 4 号,1922 年 3 月 15 日。

<sup>0</sup> 刘廷芳:5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6,5生命月刊6第 2 卷第 7 期,1922 年 3 月。

» 田汉:5日本学者对/非宗教运动0的批评6,5少年中国6第 3 卷第 9 期,1922 年 4 月 1 日,第 18 页。

<sup>4</sup> 5前锋6创刊号,1923 年 7 月 1 日,见5瞿秋白文集6,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73 页。

义者压迫殖民地民众的工具<sup>0</sup>,因此要坚决收回教育权。<sup>1</sup> 达林也曾直接发出指示,揭露基督教青年会所谓/非政治的组织<sup>0</sup>的性质。<sup>°</sup>

因此,可以说共产国际代表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对非基运动影响是深刻的。他们抓住了西方在华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重锤正打在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环节上,收到了既打击了基督教会,又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双重效果,从而促进了青年的觉悟。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这是一场非常有效的反帝运动,使得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教育机构从此在青年中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文化侵略的指控,在持续几年的宣传运动中,形成了一种深刻的集体记忆,使得青年人与教会接触时多了一份民族主义的戒备心理,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经验为基础的反对基督教的思想,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从理论上讲,俄共对宗教的看法有简单化的倾向,把在人类社会中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仅仅与阶级制度、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等同起来,把剥削阶级被推翻看成宗教命运的终结,因而导致宗教上激进主义的倾向。”其次,他们忽视中俄两国宗教与社会的区别。中国基督教与俄国东正教等体制宗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基督教会,特别是分散的新教从来不具有俄国东正教那样体制化的权威,在中国社会封建传统瓦解过程中,基督教的现代事业曾经是进步的因素。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中,基督教培养的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

<sup>1</sup> 5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sup>6</sup>,第 358\$ 359 页。

<sup>°</sup> 5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意见<sup>6</sup>(1924 年 3 月),5 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sup>6</sup>,第 133 页。

» Bohdan R. Bociurk iw,/ Religion and Atheism in Soviet Society<sup>0</sup>, see Richard H. Marshall, Jr. (ed.), Aspects of Religion in the Society Unii on, 1917\$ 1967(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 45\$ 46.

用。根据俄国革命中宗教与革命的关系来界定中国革命中基督教的性质和作用,显然脱离了历史实际,有过左的倾向。

实际上,当时参加非基运动的恽代英对基督教的看法就与维经斯基简单化的分析不同。恽代英在大声疾呼反对文化侵略的同时,仍保持着一种冷静和理性的态度。他提出了反对文化侵略运动应注意的四个方面。一是反对文化侵略,但/并不是说反对欧美的文化,我们并不否认欧美文化之优点,而且承认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我们所谓反对文化侵略,决不是盲目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sup>0</sup>。二是/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阴谋<sup>0</sup>,并不是/反对在对待所谓处于帝国主义软化驯服手段之下的教徒、教会学校的学生和留学生<sup>0</sup>,而是希望他们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巢穴里打出来<sup>0</sup>,/只有他们能起来反对文化侵略,才能掘倒文化侵略的根基,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sup>0</sup>。三是反对宗教,但/我们今天并不要将基督教的地位一概抹煞<sup>0</sup>,并且提倡赞助教会的自立运动。四是反对文化侵略,但决不谩骂教士、教会学生和一般留学生。<sup>1</sup>他在基督教办的岭南大学的讲话中甚至对基督教及其教育活动的积极意义也有所肯定。他说:/我的意见,决不轻看耶稣的为人,我相信耶稣是古犹太的一个-圣人-,象孔子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圣人-一样,而且我相信耶稣实在有许多超过孔子的地方。致于教会中人,我确亲眼看见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认自己实在受了教会中好人的若干影响。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我相信很多都出于外国先生们个人的好意思。<sup>0</sup>他之所以主张反对这种事业/只是因为外国先生是爱他们本国的。他们为中国人办学,一方面要为我们中国人谋幸福,然而另一方面亦决不愿意他们所教育的中国学生反对他们的本国。所

<sup>1</sup> 5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6,5 恽代英文集6 下卷,第 823\$ 826 页。

以,英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英亲善;美国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美亲善。<sup>0</sup>因此,中国青年在外国人所办学校接受教育,会产生对外国的感情,所以该国成为中国所反对的帝国主义目标时,中国青年的斗争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学校应该被取缔。<sup>1</sup> 这种看法显然更易为社会所接受,更易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而真正有利于民族民主革命。

另外,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参与中国革命期间,中共对宗教的政策也显示出俄共对宗教问题的影响。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共党纲草案中,就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提出了/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要求如下:1.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sup>0°</sup>。把教会置于限制外国势力的首位,反映出在俄共影响下的早期中共领导层对基督教会的看法。其后在土地革命时期,这种影响也非常明显。如193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提出:/对于反基督天主教问题,应该不只限于驱逐牧师教士出境,或加以逮捕,而是应当动员群众作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sup>0</sup>”193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指示5宪法原则要点6第13条规定:/保证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sup>0¼</sup>对照土地革命时期真正的紧迫的武装斗争,这些指示都过于强调

<sup>1</sup> 5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在岭南大学的演说词6,5恽代英文集6下卷,第815页。

<sup>0</sup> 5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6(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 5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6(1931年6月6日),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¼ 5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6(1931年11月5日),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7册,第462页。

了基督教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影响。显然,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发现的那样,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乡间的影响是有限的<sup>1</sup>,而在革命的策略中如此强调宗教问题,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其受苏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反宗教运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一过分强调反宗教的激进倾向直到红军长征之后才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比较成熟的宗教政策所代替。<sup>2</sup>

亲身经历非基运动的达林,在晚年回忆列宁批评 1921 年共产国际三大决议说:“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sup>3</sup>达林说:“现在,当我写中国工作的回忆时,我经常想,我们往往没有充分倾听列宁的这些话,并有时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机械地搬到另外的环境。”<sup>4</sup>这里是否包括了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宗教方面对早期中共的影响呢,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1 作者陶飞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2004362

=责任编辑:黄春生>

<sup>1</sup> 5 寻乌调查,5 毛泽东文集 6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0 页。

<sup>2</sup> 详见陶飞亚抗战期间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5 文史哲 6 1995 年第 5 期,第 105 15 页。

<sup>3</sup> 5 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5 列宁选集 6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69 670 页。

<sup>4</sup> C.A. 达林:5 中国回忆录:1921 1927 年 6,第 132 页。

described as / the Party is in the upper classes, but not in the lower classes; the Party is in the cities, but not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arty is on the coast, but not in the interior.<sup>0</sup> Before the War, the majority of the Guomindang's party members were from the middle or upper classes. The Guomindang did not educate its party members to be a model for all society, but recruited people who already were or had potential to be in power. A study of prewar public opinion's view of the Guomindang can help us revise the idea that the Guomindang's loss of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only became clear during the late war years and postwar period.

##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Fifth Anti-encirclement Campaign:

An Investigation not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ilitary Strategy , , , , , , Huang Daoxuan(80)

The Guomind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ifth / Encirclement<sup>0</sup> and / Anti-encirclement<sup>0</sup> campaigns from 1933 to 1934 constituted a total war between two political powers with independent territories, gov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war ended in failure for the CCP. Aside from the widely known problem of unwise military strategy, the failure of the CCP was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Guomindang'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Not only that, quite apart from / left-leaning<sup>0</sup> subjective factors, the mistakes in the CCP's military strategy were themselve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pressure from the Guomindang. As a protracted war of attrition waged by the Guomindang and met by the CCP, the campaign found the Soviet Area hard put to provide the personnel, material and other war resources needed for a protracted campaign of attrition. The erosion of the CCP's political resources under the / leftist<sup>0</sup> leadership further prevented the CCP from making full use of its fighting abilities. All of these factors affected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war to some extent.

##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 , , , , , Tao Feiya(114)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1920s was a political struggle directed by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and the Far Easter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ponsored and led by the CCP and joined by members of the Guomindang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gard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growing pro-American feeling among Chinese youths as obstacles to gett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follow the Russian road of revolution. Therefore, the aim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was to combat Western religious forces in China, weaken the West's influence, arouse nationalist feelings in young Chinese, and exte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mong Chinese youths. The movement's policy was to use the fight against Christianity to achieve its



goal of resisting imperialism. This policy made definite gains, however the statu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 The measures taken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influence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based as they were on experiences of anti-religious struggl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ere prone to be too leftist, and this tendency didn't begin to be corrected until the end of Red Army's Long March.

The Flow of Guomindang Currency between Chinese-Controlled and Enemy-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 , , , , , , , , , , , , , , , Qi Chunfeng (137)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Guomindang currency (fabi) flowed informally on a large scale between the Chinese-controlled rear area in West China and enemy-occupied areas. This phenomenon was mainly instigated by Japan, and was related to the weakness of the rear area economy. Before the Pacific War, Japan acquired fabi by smuggling and dumping goods in the Chinese rear area, and then illegally purchasing fabi foreign exchange funds on the Shanghai fabi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Pacific War, the Japanese first took the fabi they had acquired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drove it into the Guomindang-controlled rear area by offering seductively high prices for material resources. After this quantity of fabi was used up, they tried to acquire fabi by other means and use it to buy away the rear area's material resources. Japan's aim in instigating the flow of fabi was to promote the financial collapse of rear area. However, although Japan illegally purchased a large sum of fabi foreign exchange before the War and purchased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s from the rear area,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financial collapse of the rear area was not achieved. Why? Because the Guomindang Government got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other Allied countries and was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Guomindang Government's material war against Japan also complemented its currency war against Japan.

A Review of Western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 , , Cui Zhihai (170)

An Innovative Monograph: Reading Hu Sheng on /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0 , , , , , , , , , , , , , , , , Zhou Yiping (179)

Catalog of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2002 , , (202)

English abstracts translated by Du Jidong and edited by Alexander Beels